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在学术规范上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引用资料的注释，无论是作为脚注还是以附录的形式。这一缺陷或许对一般读者而言无伤大雅，但却会有损读者试图求证、拓展阅读的可能。

本书谈论的主题，按作者安舟的话来说，是试图解释中共为何放弃了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愿景，而以圣西门的社会分级的社会主义相取代。即从敌视专家治国论向技术官僚治国的转向，一步步走到今天“由红色工程师统治”的局面。

本书立足于对清华大学这一单一的教育机构的案例研究，本书的四大中心要素为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教育制度及政治制度。“红色工程师”崛起的历程，可以被视作这四大要素，前后两两合一的过程。

作者采用了苏联的例子作为对比，指出，苏联也经历了中共从铲平阶级向专家治国道路的转变，但不同的是，中国转向专家治国的历程要漫长得多，其间经历了数次反复，尤其以文化大革命最为激进。因此，本书最多的篇幅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占据了本书近一半的页面。

以清华大学为观察的视角，这使得本书的叙述相当集中，所引用的案例较为新鲜。但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就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单单是从清华大学师生的视角出发，文化大革命的经过的讲述将会相当混乱，极不容易把握住背后的逻辑。有许多事件，在作者的笔下往往是糊里糊涂地记上一笔，却不能明白事情完整的前因后果。就以“走后门”问题举例，毛泽东之所以会同意不搞反对“走后门”的运动，是因为他自己就多次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让一些人进入到了大学里读书。

作者笔下的清华大学前三十年历程中，我们有时候会于恍惚中看到鹤见俊辅所说的“密宗”与“显宗”，即在铲平阶级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清华大学仍出现了唯才是用的转向。关于此点，以及毛泽东死后向技术官僚治国的全面转向，作者在总结中所引用的分析比较合理，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促使乌托邦的空想在现实面前让步。

本书关于清华大学的案例考察是有价值的，作者对“红色技术官僚崛起”的理论分析也可借鉴。不过本书也有不少的遗憾，一是理论的分析较少，集中于导言和结论，还远远不够;二是本书的对照仅限于苏联，“专家治国”是否是一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官僚系统与选举政客相结合的系统和这一体系有什么差异；三，为何是技术官僚的崛起，而不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走上领导者的岗位？可以推测的一点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往往做不到“又红又专”，二者往往只能择一而就。